

HUANGZONGXI YU ZHEDONG XUESHU

黄宗羲与浙东学术

徐定宝 著



海洋出版社

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课题成果

宁波市文化服务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课题成果

黄宗羲与浙东学术

徐定宝 著

海洋出版社

2010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浙东学术是浙东文化范畴内的一个重要现象,故而本书首先对浙东文化的几个概念、表现形态、核心价值及基本精神等进行了必要的阐述;重点在于挖掘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对人文精神、政治理念、史学理论、哲学观念等在内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揭示与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产生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影响作了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书中还就浙东学术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所处的高端地位,对儒家传统所起的一定程度的总结性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从而在把握黄宗羲与浙东学术历史贡献的同时,充分显示出其对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与价值。在全书的最后附加了黄宗羲年谱简编及有关黄宗羲研究论著简编,以备研究者参考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宗羲与浙东学术/徐定宝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27 - 7821 - 7

I. ①黄… II. ①徐… III. ①黄宗羲(1610~1695) —
人物研究②浙东学派—研究 IV. ①B249.3②B24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290 号

责任编辑:陈莎莎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25

字数:290 千字 定价:62.00 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引 言	(1)
第一章 浙东文化视野下的浙东学术	(7)
第一节 浙东文化的几个基本概念	(7)
第二节 浙东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	(9)
第三节 浙东文化的核心价值	(13)
第四节 浙东文化的基本精神	(27)
第二章 黄宗羲的学术生涯	(32)
第一节 黄宗羲的学术生命	(32)
第二节 黄宗羲在宁波的学术活动	(48)
第三章 黄宗羲的学术思想	(54)
第一节 浙东学术思想中的人本精神	(54)
第二节 黄宗羲的政治理念	(65)
第三节 黄宗羲的史学建树	(78)
第四节 黄宗羲的哲学探索	(97)
第五节 黄宗羲对浙东学术的其他贡献	(118)
第四章 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影响	(136)
第一节 明、清易代与新经济形态的出现	(136)
第二节 黄宗羲学术的思想渊源	(139)
第三节 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时代进步	(145)

第四节 黄宗羲政论思想的历史影响	(156)
第五章 浙东学术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与总结	(161)
第一节 浙东学术与齐鲁学术	(161)
第二节 儒家学术的原创:齐鲁学术	(165)
第三节 儒家学术的顶峰:浙东学术	(184)
第四节 浙东学术对齐鲁学术的继承与跨越	(188)
第六章 附录	(209)
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69)



引言： 黄宗羲与浙东学术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史学派”，继承并弘扬了南宋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派”的为学宗旨与治学风格，其核心内涵是“经史并重”与“经世致用”，而这一治学原则也同样体现在“浙东心学派”与“浙东理学派”之中，因此，“浙东学术”的外延十分丰富，包括自南宋至清代几乎所有浙东区域的学术派别。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史学派”常被当作“浙东学术”的代名词出现，这似乎成了学术界不争的事实。然而，细加探索，这里尚存三个层面的问题仍值得人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其一，形成于清代的“浙东史学派”，毕竟不能等同于“浙东学派”，而两者为何可以相提并论？其二，南宋的“浙东学术”也常以“浙东学派”之面目显现，那么它与清代的“浙东史学派”存在着何种足以相通的关系？其三，究竟如何认识“浙东学术”？它指的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抑或清代的“浙东史学派”？还是两者的统称？它该不该涵盖着这一历史时期浙东区域的其他学术流派？解读这几个问题，并真正找到明确的答案，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明清时期伟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学术贡献及把握“浙东学术”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价值。

把清代“浙东史学派”当作“浙东学术”的典型代表，是不会引起太大的学术分歧的。理由很明显：清代“浙东史学派”的为学宗旨充分体现着“浙东学术”的风格，而这种学术风格又突显于黄宗羲的治学原则之中。梁启超在《论近世之学术》中明确说道：“浙东学派于吴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致用过之，其源出自梨洲、季野而尊史。”而且以为“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章实斋，厘然



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①。因此，在梁启超的学术视野中，清代以“尊史”、“致用”为治学特征的学术流派之创始者当推黄宗羲，梁氏的这种观点之所以为学界所接受，在于他揭示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学术精神。

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黄宗羲是位被公认的了不起的史学大家，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与贡献是卓著的，既有精辟而富有创见的史学理论，亦有对史学表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还有对当时《明史》撰修作出过间接与直接的帮助。而其间更为重要的是，黄宗羲为浙东学术奠定了最基本的治学精神，即所谓“经史并重”与“经世致用”。黄宗羲主张学问之道须“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穷其委”^②，认为“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③ 在黄宗羲看来，“经”是载道之书，“史”是载道之文。不可不读“经”，而“参之史”亦十分重要。只有“经史并重”，才能学有所成。若只重经而不读史，则学者就难以把握社会变迁的深刻道理。故而强调“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迂腐，必兼读史”^④，并指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⑤ 可见黄宗羲把“读史”已提到“欲免迂腐”而“适于用”“经世之业”的高度上对待，注重史学也就成了黄宗羲的重要治学原则。同时，我们也看到黄宗羲重视“读史”是为了“适于用”社会。黄宗羲坚决反对空谈学问，力求为学务实，虽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然“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⑥“应务”成了治学的终极方向，强调“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⑦ 这一“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也就成了黄宗羲基本的治学精神。因此，黄宗羲“尊史”而又重“致用”的学术风格不但成了其学术思想继承者诸如万斯同、全祖望、邵晋函、章学诚等学人的为学宗旨与治学原则，也成了清代“浙东史学派”所代表的浙东学术的学术特征与治学风格。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②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一。

③ 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

④ 《清史列传·黄宗羲传》。

⑤ 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

⑥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⑦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

之所以可将清代“浙东史学派”说成“浙东学术”的代表，还在于前者与南宋期间的“浙东学术”，即浙东事功学派，在治学精神上存在着相通与相同的地方。综观南宋的浙东学术，主要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倡导的是“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强调道存在于物，“物之所在，道则在焉”；^① 陈亮提倡的也是“事功之学”，以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批评为学只讲主观动机而侈谈“道德性命”，反对“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的虚浮学风。由于陈亮的“永康学派”与叶适的“永嘉学派”强调的是“事功”，^② 故人们常以“事功学派”相称之，以突显其为学的务实的特点。吕祖谦的“金华学派”虽兼有朱熹之“理学”与陆九渊之“心学”，然其治学精神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相贯通，强调“明理躬行”的为学主张，提倡“讲实理，育实干，而求实用”的为学宗旨，^③ 从治学精神上看，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都崇尚实学，在为学的宗旨上都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因此说南宋浙东学术开启了“浙东学派”治学风格之先河似不为过。而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派”的治学精神更多的是继承了南宋“事功学派”的为学宗旨，也就有了无可置疑的历史依据。很多学者据此把清代以务实为宗旨的“浙东学术”与南宋包括吕祖谦在内的“事功学派”视作在学术精神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两个学术流派，在广义的“史学”范畴内，它们都可称之“浙东学派”。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宋与清代的“浙东学派”其治学精神基本出自于南宋的“事功学派”与清代的“浙东史学派”。若用章学诚的话说，即“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以为“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④ 如用黄宗羲的话来总结，即“究史”之目的不在于史，而在于应用，只有“证明于史籍”，才可“足以应务”。^⑤ 因此，浙东史学的治学精神不论在南宋或在清代都具备“经世致用”的特色，也就为“浙东学术”的学术风格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基

①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习学记言》。

② 陈亮：《龙川文集·送吴运成运输序》。

③ 吕祖谦：《太策问》。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辛氏遗书·命与桐训传》。

⑤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本的学术精神。

需要补充的是，在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术中还有一个颇具影响的“深宁学派”，就是以王应麟为代表的学术流派。王应麟的“深宁学派”在表现“浙东学术”的学术共性上十分明显。全祖望于《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曾明确指出“王尚书深宁之学，独得吕学之大宗，或曰深宁之学得之吕氏”。^①有学者尽管对“浙东学派”存在于明清时期抱有异议，然对宋元际吕、王学术特征的共同性常持肯定的看法，说“吕祖谦既著《大事记》，其后又有王应麟籍于浙东之庆元，究心史学，著述最富，亦承永嘉、金华之风而兴起者也”。^②的确吕祖谦的“金华学派”虽兼有朱熹之“理学”与陆九渊之“心学”，然其治学精神与陈亮、叶适等的事功学派相贯通，强调“讲实理，育实干、而求实用”，^③其崇尚实学的“经世致用”意识，无疑是“浙东学派”思想风貌的展现。而王应麟的“深宁学派”在学术思想上充分继承了吕祖谦的学说，正如全祖望所言，王应麟“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吕祖谦）”，称得上“吕氏世嫡”，^④其在治学上也十分注重经世致用，常以济世应务为目的，他撰写《诗地理考》就是为了“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⑤其治史之风格与浙东学派的为学宗旨别无二致。因此，将王应麟“深宁学派”在学脉与理路的特征上归属于浙东学派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在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术中，把杨简的“慈湖学派”与王震的“东发学派”列入“浙东学派”之中，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前者属于“心学”，后者属于“理学”。从两者治学的道路上看，杨氏与黄氏走的并不是一条途径，然各自都能做到宗陆学不弃朱学，崇朱学不忤陆学，尽力做到兼取其长，融会贯通。杨简在治学中进一步发展了陆学“以心为本”的理论，并形成唯我论体系，开创了“浙东心学”的先河。由于杨简博学于文，注重经史之学，有学者在论述“浙东学派”时就将其包括于内，以为“传统所谓‘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皆属于‘浙东史学派’之范畴”，该学派以吕祖谦为集其大成并为其思

①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③ 吕祖谦：《太学策问》。

④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

⑤ 王应麟：《诗地理考·自序》。

想上典型代表，“浙东心学派”则确立于“甬上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麟、沈焕，而“以杨简之影响为最大”，^①此说把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与杨简为首的“浙东心学派”纳入于“浙东学派”的大范围之内，也是有道理的。将黄震包括在“浙东学派”之中看似勉强，实则有理。黄震的“东发学派”在学术的立足点偏重朱学，而不似杨简的慈湖学派偏重陆学，然黄氏不同当时理学家们普遍存在的重经轻史的治学倾向，即所谓“（朱）文台门人大抵多忽史学”，^②而主张经史并重，同样表现出“言性命必究于史”即济世务实的治学精神，正因为黄震坚守如此的为学原则，他对传承陆氏心学的杨简也有过不错的评价，说“慈湖先生杨文元公教学者，专指心之精神是谓圣……与程学所谓存心爱物者，正自符契”，且由衷地说：“慈湖之实行劲节，某岂不朝夕师尊之”。^③黄震敬重杨简而不守门户，并自觉遵循浙东学术的治学原则，全祖望对此深表赞同，有云：“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孔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④。

王阳明的“姚江学派”与刘宗周的“蕺山学派”是“浙东学派”中心学一脉的主力，体现了明代浙东学术的最高成就。“阳明心学”在儒学的发展历程上，不能不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与认知上的深刻变革。阳明心学引导人们走出以圣贤与经典为中心的“章句之学”的死胡同，一反传统的为学准则，公开表明儒学的伦理精神的获致并非需要传统的“格物”与“穷理”。所以，“良知”说不仅在伦理本质的定位上，且还在生命价值的追求上开创了儒学思辨的新天地与新格局，使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为之一震，一改宋元以降“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倡导“良知”之说，强调“知行合一”，其学注重经史，更不废事功，尤致力于伦理实践与时事世务，彰显着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刘宗周“蕺山之学”承绪“阳明心学”，又在纠正王学末流空谈疏妄之弊上起过重要作用。“浙东心学”继杨简“慈湖学派”之后，经明代王阳明“良知”说的倡导而达到的全面复兴与昌盛，不仅在当时学界独占鳌头，而且波及后世，对清代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仍有深

① 董平：《浙东学派之名义及其内涵》，收集于《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7页。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③ 黄震：《日抄》八七卷、八五卷。

④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

刻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言“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而寻源于王阳明”。^①

如上所述，“浙东学派”中的诸学派包括“史学”、“心学”及“理学”，皆非固守着某种僵化的思想学说，也不曾有过整体上严格的自始至终的学术师承与沿袭，而是在学术的学脉与理路上显示出一种共同的思辨精神。“浙东学术”中的诸学派可以注重史学，也可以倚重心学，甚至倾心于理学，但都自觉地审视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与重视主体参与社会的必要性，这种“言性命必究于史”与“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正是“浙东学术”独特而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思想精神，正因为如此造就了不少为当时社会作出卓越贡献、也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第一章

浙东文化视野下的浙东学术

浙东文化与齐鲁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一样，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浙东文化以鲜明的区域特色及厚重的学术底蕴在中国文化史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浙东文化视野下的浙东学术，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把握浙东学术的极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因此在研究浙东学术的同时，认真审视浙东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件很有必要的事。今天，时代的车轮已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我们在考察浙东文化时，既需要重视浙东文化的理论基础，更要于其中寻找浙东文化的思辨精神，尤其是浙东文化所折射出的人文色彩、实践意识与超越时代的影响力。而这些具当代价值的思想因子，无疑有助于今天新时代精神文明的促进与提高。

第一节 浙东文化的几个基本概念

浙东文化的理论基础首先涉及一些基本的概念。人们在探讨浙东文化时，常会遇到诸如“浙东文化”、“浙东学术”、“浙东学派”、“浙东”、“文化”等，若对这些名称不作概念上的界定，就有可能引起认知上的模糊与理解上的歧义。不利于对浙东文化理论形态的把握。

何谓“浙东文化”？在审视这个概念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赋予不同的内容。本文以为：凡由浙东学人倡导或发生在浙东区域的，并对当时社会生活发生过重要作用，在后世仍具有影响的思潮、学说、历史现象等，皆可称之“浙东文化”。从时空的角度看，它是古代的，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现代（不包括当代），又在内容上显示出丰富性与多样性；从因果的角度看，它的缘起与浙东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而它的过程或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浙东，甚至在海内外都产生过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

何谓“浙东学术”？所谓浙东学术是指浙东学人创立的具专门性与系统性的学说或学问。如王阳明的心学、黄宗羲的民主启蒙学说等。浙东学术是浙东文化的核心，并彰显着浙东文化的历史地位。浙东学术的外延呈现出多元性，而其基本内涵则主要表现于哲学思辨与史学精神的结合上，颇具博大精深的特色。明、清时期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学术文化，则可视为浙东学术的精髓，是浙东学术的闪光点，其思想学说对后世影响甚远，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

何谓“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是出现于清代及此前的浙东学人依据一定的思想学说或学术观点所形成的学术派别。对浙东学派的说法，学术界仍未统一。本文以为：浙东学派既指浙东某一具体的学术派别，又是历史上浙东学术派别的通称。浙东学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着各不相同的流派名称。如南宋时，有以杨简为代表的“慈湖学派”，有以黄震为代表的“东发学派”；在宋末元初有以王应麟为代表的“深宁学派”；在明代，有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学派”，有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在清代，有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等。这些与浙东区域相关的学术派别，皆可称之“浙东学派”。

何谓“浙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浙东文化中的“浙东”与现在人们概念中的“浙东”是不一样的。在古代，整个浙江地域以钱塘江（或曰制江、浙江、浙水、之江等）为界而被划分为两大片，位钱江之东者，称为“浙东”，在钱江之西者谓“浙西”，而没有“浙北”、“浙南”之称。浙东在旧志上有“八府”，即严州府（今建德）、金华府、衢州府、绍兴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今丽水）；浙西有“三府”，即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故浙江在传统的称法上有“上八府”、“下三府”之谓。因此，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浙东”应是包括现在的浙西金华与浙南温州等在内的广袤地域，对此我们有时称之为“大浙东”，而常将绍、甬、台区域称为“中浙东”，又把现在宁波大都市所辖的各县、市、区，即包括“老三区”及鄞州、镇海、北仑、慈溪、余姚、象山、宁海等，称之为“小浙东”。很多学人在论及浙东文化时，若从区域的位置着眼往往指的是“小浙东”，也就是宁波大都市的区域范围。

何谓文化？这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英国著名学者罗威勒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此话一点不假。当今有关文化的论述及对“文化”一词的诠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对“文化”一词的界定，尽管尚未定论，然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其本质内涵的把握。笔者十分赞同这样一种说法：文化乃人类于生存活动中，为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及精神需要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及其结果。如果说，人类的物质活动、社会活动及精神活动的总和在文化的指称上可谓“广义文化”的话，那么剔除其中的物质性的过程与结果，专指社会性与精神性的文化现象，则当属“狭义文化”的范畴。“浙东文化”如从抽象化的思辨层面上看，应该是一种狭义的文化，但“浙东文化”已拥有相当丰富的被展现出来的地下遗存，当这些具象化的器物层面与抽象化的思辨层面相整合时，也多少表现出广义文化的某些侧面。

第二节 浙东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

浙东文化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其文化的表现形式。浙东文化源远流长。若以史前河姆渡文化为一端，又以20世纪前半叶星光灿烂的革命文化为另一端（暂不包括发达的当代文化），则之间的距离有7000年之遥。在轰隆滚动的历史车轮之后，留有着无数的文化辙印，它既是浙东文明进步的时代见证，也体现着浙东文化的昔日辉煌。为便于观照，我们不妨将这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浙东文化的发生期、发展期、繁荣期及转型期，从中窥察浙东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并由此看到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别的生动呈现。



一、浙东文化的发生期

浙东文化的发生期当在史前的河姆渡年代。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河姆渡文化是大量而丰富的史前出土遗存，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为非野生的稻谷遗物。据称，刚出土时稻谷色泽黄亮，外壳完好，连稻毛与谷芒都清晰可辨，经鉴定均系人工培植的水稻谷物，而且当时水稻种植面积的模式已经很大，与稻谷遗物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水稻的种植与加工工具，如耕作用的骨耜，除草、翻地用的木铲、锄头，谷物加工用的石质磨

盘、木杵等。数量可观的出土鹿角还表明河姆渡人已能利用物候来测定种植的季节。可见中华农耕文明遗存，在时限上还要再上溯 2000 年有余。由此推翻了学界的既定结论，并雄辩地证明了长江中下游的农耕文化是独立发展而成的。以河姆渡出土遗存为典型代表的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一起，共同创造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进步。



二、浙东文化的发展期

浙东文化的发展期若自先秦算起至明代，约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跨度，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在浙东区域最引人注目的有六大文化现象：家族文化、宗教文化、青瓷文化、教育文化、藏书文化、建筑文化等，是浙东文化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成为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切入口。浙东宁波的虞氏家族文化始于三国而著名，延续至两晋，又经南朝宋、齐、梁、陈，直到隋唐才趋衰落，历时八代计 400 余年，产生过有全国影响的杰出人物，如经学家虞翻，天文学家虞喜、文学家虞羲、书法家虞世南等，虞氏家族文化盛行数代而不绝，《雍正慈溪县志》故惊叹道：“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虞氏者也。”此外，南宋时鄞县的史氏家族，即以史浩为代表的“一门三宰相”及慈城的“冯氏家族”等，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里也出现初步繁兴的迹象。佛教自东汉传入浙东，于两晋南北朝时发展迅速，并在宁波各地开始建造寺庙。西晋禅师义兴在鄞东结茅参禅，为天童寺前身，僧人竺惠达在鄞县乌石岱建舍利塔，后发展为现在的阿育王寺，东晋尼姑建瀑布院于奉化，即为后来的雪窦寺。入宋之后，佛教重心由绍兴、天台移至宁波地区，南宋所定的“五山十刹”中，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均名列其中。浙东一带道教在晋代颇为流行，多以丹药、符篆为传播形式，至今在宁海尚有葛洪后裔 4 万余众，当年葛洪及陶弘景留下的遗迹在象山、余姚、北仑、宁海等地仍有不少，然终以其教义艰涩与传布不易而一直未能像佛教那样深入人心。青瓷文化在浙东以宁波上林湖地区为中心，自东汉至唐宋，有过千年的辉煌历史，特别是唐宋时期被称之陶瓷花苑里一支艳丽奇葩的“秘色瓷”，更是青瓷群体中的佼佼者，难怪当时文人墨客，如孟郊、皮日休、陆龟蒙、陆羽等以优美的诗句大加



赞美，也不足为奇了。教育文化在浙东以北宋“庆历五先生”、南宋“甬上四先生”为代表，他们均讲学于宁波。由此搭建了浙东教育文化的平台，奠定了良好的区域文化氛围。“盈实人家”与“书香门第”往往成为浙东区域市民生活的追求目标。这种文化心态与两宋的教育文化有关。另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

三、浙东文化的繁荣期

浙东文化的繁荣期当在明、清两代，尤以浙东学术文化为代表。浙东学术文化的涵盖面很广，其代表是发端于明中叶王阳明倡导的“心学”、明清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倡的“经世致用”学说、入清后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全祖望等对于学术的贡献，以及清中叶浙东学派殿军章学诚的史学成就等构成的历时 300 余年的“浙东史学派”。这一文化现象以其鲜明的学术个性对几千年传统文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而名扬宇内。阳明心学是对传统的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使长期甘心于奴隶地位的人们开始觉醒，起来冲破礼教的思想牢笼，其振聋发聩的思想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应当看作仅仅是儒学内部的学术纷争，而是一场涉及面广的思想大革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心学”的合理内核，但又突破了心学的框架。黄宗羲特别强调主体修养上的“事功”方向，提倡建功立业，认为学问需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其所宣扬的“经世应务”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同时，黄宗羲还以启蒙思想家的目光对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作了一番深刻的审视，并对改革君主政治体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其中有关对皇帝的权力制约机制、“公非是于学校”的舆论监督机制及倡导“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上所发生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变化，也体现出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的一种历史趋势与要求。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意识与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见识奠定了其作为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也是由黄宗羲为创始者的清代浙东史学经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继承与宏扬，成就卓著，闻名遐迩。

四、浙东文化的转型期

浙东文化的转型期，主要表现为商贸文化与革命文化。鸦片战争之



后，浙东地区、尤其是以宁波为中心的商贸活动迅速发展。宁波商人在商界异军突起，令世人瞩目。宁波商人自明末在京城建“鄞县会馆”之后，其结帮经商、兴办实业之风盛行。他们不仅活跃于浙东区域，而且在外埠如上海、天津、福州、武汉等商业重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商活动。其能商善贾之名亦著闻海内外。在传统文化观念仍占上风的晚清与国民时期，他们靠自身的坚定信念与不懈的努力，使“宁波商帮”作为后起之秀而声势日隆，在日渐衰败的封建经济格局内顽强地拓展者具有资本主义特质的商业与工业。宁波商帮的经商理念与经营项目，都出现许多独创性的突破，在改革世风、促进新兴事业的开办及引领社会新潮流等，起到了时代领头羊的作用。《鄞县通志》有云：“改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对宁波商帮作过如此评价：“宁波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这些评语，既表示对宁波商帮所做的历史贡献的肯定，也显示着浙东商贸文化的巨大影响与魅力。革命文化是植根于浙东人民在鸦片战争前后反抗殖民者入侵的斗争及辛亥革命时期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基础，并在继续与反动势力、反动政权展开浴血奋战的新民主革命时期中表现得更加充分。浙东革命文化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抑或解放战争时期都显得十分活跃，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抗日战争时期，四明山的文化事业尤为红火，出现了充满战斗活力的新型文化机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创办了“时事简讯社”，出版《时事简讯》，新华社浙东支社也相继成立，革命根据地还出版《浙东报》及党的机关刊物《新浙东报》。著名的“韬奋书店”、“鲁迅艺术学院浙东分院”、“四明文教工作者协会”等先后成立。这一时期，也产生过不少知名度很高的浙东籍文化人士：有教育家杨贤江，“左联”发起者之一的朱境我，一直在文化界、教育界为党工作并担任过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国画大师潘天寿；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著名的浙东籍革命作家与进步人士，如王鲁彦、巴人、楼适夷、唐弢，而“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殷夫、应修人三位，为革命文化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值得人民怀念。